

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

蔡鸿生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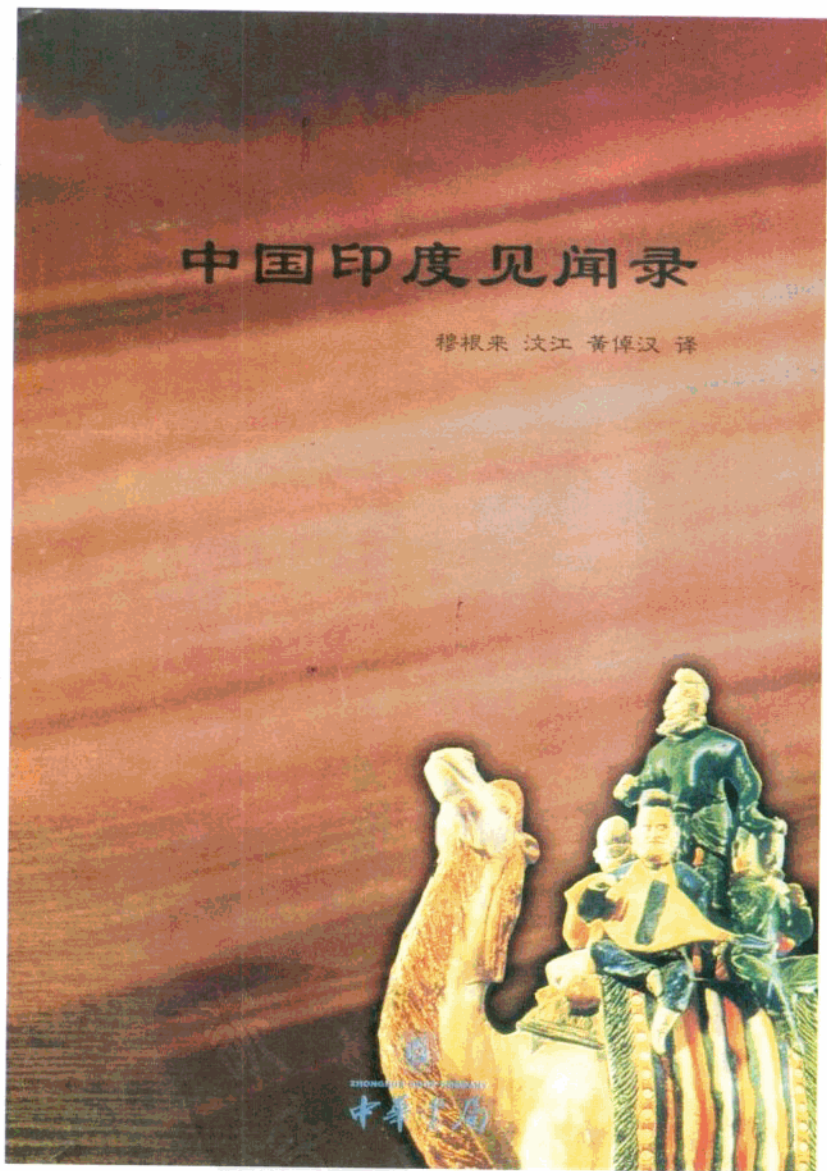
古代广州的外国商人

陈学军 /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印度见闻录

穆根来 汶江 黄倬汉 译



《中国印度见闻录》封面



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洲头嘴的中国与阿曼通商纪念碑。修于1995年，重修于2002年10月（陈学军摄）。



《南海甘蔗蒲氏家谱》封面（原书藏孙中山文献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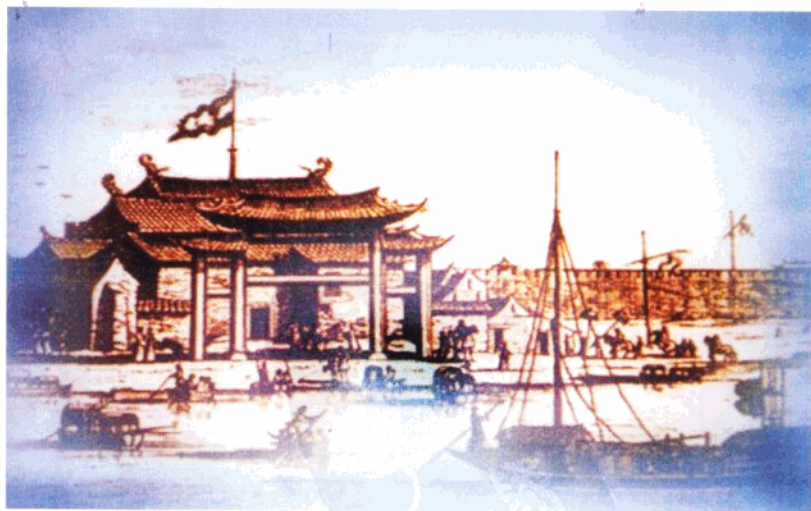
怀圣寺塔，相传初建于唐代，此后多次修葺。现塔为1934年重修（陈学军摄）。



清十三夷馆图（原载《广州历史文化图册》）



赤岗塔基的蕃鬼（柏峰摄）



怀远驿素描刻印的版画（赵殿红摄于“清代广州十三行史料陈列馆”）

《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

主 任：杨资元

副 主 任：程 慧 陈泽泓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李明华 张荣芳 张影华 陈锦鸿

胡巧利 赵春晨 唐文雅 龚伯洪

曾昭璇 曾 新 甄炳昌

执行委员：胡巧利 张影华

《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委托编审委员陈泽泓、胡巧利负责审定本书。

《广州史志丛书》出版说明

当代的地方志工作，是一项具有延续性的长期事业，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编纂一部志书，更需要多方位地开展地情调查、地情研究和地情服务。只有这样，地方志的资政、存史、教化功能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在编纂广州市志的同时，还积极发动修志人员和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地情调查、积累地情资料、开展地情研究、提供地情咨询服务、编写地情丛书、整理旧志、进行方志理论研究等，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志书体例的局限性以及一部市志篇幅的限制，许多地情资料和地情研究成果不能入志。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将有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广州史志丛书》的形式公开出版，为广州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广州史志丛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一、有关广州历史情况的旧方志和其他古文献的整理；
- 二、今人有关广州地情的著述、研究成果；
- 三、史志理论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的编审工作由《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负责，并由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

《广州史志丛书》将陆续出版，恳望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内容、形式及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

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总序

蔡鸿生

广州位于南海之滨，从古代贸易港到近代通商口岸，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它的地形地物，长期被形容为一艘“大舶”，即巨型海船：“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橦，五层楼其航楼云。”（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9）“会城如大舶”一语，尽管出自“形胜家”即风水先生之口，却浓缩着通海放洋的悠久传统，提示后人对广州与海洋文明的关系，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

时至今日，在广州历史研究中，如何把“舶”字做深、做活、做大，似乎还是有待探讨的问题。蕃舶被洋舶所代替，与和平贸易变成商业战争有什么关系；唐宋时代的舶商与近代形成的“公班衙”，在贸易体制上差别何在；古代的舶牙与清代的行商各自形成什么样的“南海观”和“西洋观”；“舶来品”的经济内涵和文化内涵应当作何理解；登岸后的精神舶来品和物质舶来品有何不同的命运；西学东渐，广州首当其冲。“舶来”与“舶去”的互动关系究竟怎样；缺了一部《广州洋舶录》，载体无影无踪，海港岂不成了空港？如此等等，倘若没有不断地拓展史料，不断地深化论题，不断地改进方法，要想做好“舶”字这篇大文章，对“华夷估舶自成群”（魏源句）的广州作出中西会通的历史阐释，恐怕任何妙笔都是难以生花的。

为了推动“广州与海洋文明”的研究，市方志办不遗

余力，惠予立项，及时地组织了这套知识性丛书的编写工作。承担各个专题的执笔人，都是学有专长的后起之秀。限于体例，他们虽有厚积而只能薄发，化大力来写小书。难道这就英雄无用武之地？西方有句谚语颇能开人心窍：“宁可做小的大作家，不要做大的小作家。”只要在大小之间确定理性取向，缩龙成寸，以小见大，就不会妄自菲薄了。我们要以卓越的史学前辈为榜样，新会陈援庵先生的名著《清初僧诤记》，气格那么高，学术含量那么大，篇幅却只有5万字，堪称“伟大的小书”。面对着潮水式的“泡沫学术”，让我们心明眼亮地取法乎上吧。

《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的出版，可说是群策群力、集腋成裘的一次学术协作。集腋之劳，分属执笔人；成裘之功，应归方志办。至于我自己，无非是一个吹鼓手的角色，虽应命撰序，其实奏不出什么雅韵的高潮，只不过说几句想说的话而已。

2002年8月28日写于中山大学

本套丛书使用的照片得到以下单位和个人的支持与协助,特此鸣谢!

香港艺术博物馆

《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

《广州历史文化图册》

《七海扬帆》

《中国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

《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

《风浦古今》

《广州十三行沧桑》

《旧中国杂记》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

《海程志略》

《胡志明市的会馆》

《侨联四十年》

《侨联三十年》

《粤海关志》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广州文化博览》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发现中国》

《走向世界丛书》之一《西学东渐记》

赵殿红 胡根 梁承鄧

目 录

第一章 南海道上的外国商人	1
1 广州外贸源流	2
2 广州最早的外商记录	5
3 弘法僧、求法僧与外商	11
4 贪泉、贪官与外商	16
第二章 蕃坊与唐代广州的外国人	22
1 市舶使的设立及其与外商的关系	23
2 唐代岭南政局与广州外商	27
3 话说广州蕃坊	35
4 《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的外商故事	37
5 唐代广州外商的人种、数目	41
6 唐诗中的广州海外贸易情景	45
第三章 宋元时期广州的外国商人	51
1 市舶司与市舶制度	52
2 广州外商纪事	58



3 外商与泉州、广州港的竞争	76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的广州外商	83
---------------------	----

1 明清之际中西大势与广州对外贸易	84
-------------------------	----

2 中世纪的绝唱——广州的阿拉伯 商人	90
------------------------------	----

3 广州最早的西欧商人——佛郎机	94
------------------------	----

4 广州街头的红毛番	97
------------------	----

5 英国佬来了	102
---------------	-----

6 广州的十三夷馆	106
-----------------	-----

7 清代广州外商生活实录	110
--------------------	-----

主要参考书目	114
--------------	-----



第一章

南海道上的外国商人

广州外贸源流

广州最早的外商记录

弘法僧、求法僧与外商

贪泉、贪官与外商



1

广州外贸源流

要说外商，不能不涉及海外贸易，而海外贸易的发展正是广州城市的发育、城市职能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可信的历史记载，广州建城至今有 2200 多年的历史，而广州海外贸易的发生远远早于建城的年代。《淮南子·人间训》说：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还不到两年，就下决心要把岭南地区并入版图，于是派遣屠睢率领 50 万大军，分五路进攻岭南。《淮南子》还特别说明，秦始皇之所以要南征，是因为看上了岭南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奇宝货。其实，这些中原地区所罕见的东西也并非岭南的土特产，它们大多是原产于东南亚、南亚的“进口”货。这则材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被称为“番禺之都”的广州已经是一个进出口货物集散地。

公元前 214 年，秦军征服了岭南。随即，秦王朝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等 3 个地方政权，任嚣被任命为南海尉。南海郡辖番禺、四会、博罗、龙川等 4 县，范围相当于今天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任嚣在白云山与珠江间选取了一块平地，修筑城廓，作为郡治，名曰番禺，又叫任嚣城，大约在今天广州市仓边路一带。



秦亡后，赵佗接替任嚣，成为岭南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派兵阻断南岭通道，兼并桂林、象郡，自立为王，取国号南越，定都番禺。作为一方都城，广州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首先，秦汉鼎新，中原饱受战火洗劫，而岭南相对安定，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水稻种植业及青铜冶铸、漆器制造、造船、纺织等手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南越国十分重视与汉的关市贸易，充分利用秦代开辟的道路系统，大量引进田耕器具及牛马等。再次，由于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开发较快，人烟稠密，经济繁荣，初步形成了拓展海外贸易所必需的经济腹地。到了西汉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汉初全国的19个城市，特别说明番禺是其中的九个“都会”之一。他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①

成书于晋代的《西京杂记》记载：有一次，南越国国王赵佗送给汉皇室一颗烽火树，高一丈二尺，有3条大枝，463条小枝。

据近代学者的考证，烽火树就是珊瑚树。这么大的珊瑚树，多半是南洋国家的进口货。

文献记载得到了广州出土文物的有力佐证。

1983年，广州出土的南越赵昧墓发现了不少原产于海外的玻璃、乳香等。其中有一只银盒最具代表性，从

^① 《史记》卷一二九，第3268页，“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造型、纹饰看，不同于中原器物，而与现在伊朗地区出土的银器十分相似。

20 世纪中期，广州发掘的西汉前期墓有不少犀角模型和一只绘有犀牛图案的漆扁壶。犀牛的原产地在非洲，广州人怎么会有对犀牛的认识呢？这很可能来自于外商带来的犀角以及对犀牛的描述。

广州出土的西汉后期墓还出土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串珠，有玛瑙、鸡血石、石榴石、水晶、硬玉、琥珀、玻璃等制成的，也有迭嵌眼圈式玻璃珠、蓝色玻璃碗等制品，这些东西与中国传统的工艺品不同，惟一的可能就是通过海外贸易而来到中国的。

20 世纪 70 年代，广州横枝岗西汉中期墓出土了 3 只玻璃碗，呈深蓝紫色，模制成型，外壁、口沿经过打磨，经性质分析为钠钙玻璃，风格、质地与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帝国的产品极为相似。

与海上贸易密切相关的实物还有熏炉、托灯陶俑。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汉墓出土的铜制、陶制熏炉数量共有 200 多件。熏炉是用于熏香的器皿，熏香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时尚，而香料主要来自东南亚、南亚和东非，如果没有数额可观的海外贸易，此项时尚很难能够流行起来。

托灯陶俑也是广州汉墓的一大特色，且在东汉以后的墓地中越来越多见。托灯陶俑形象与汉人明显不同。它的俑头较短，两颧较高，深目高鼻，下颌突出，从体





陶俑座灯

型上看属于东非和西亚的黑色人种。汉章帝时期的议郎、今广州市海珠区下渡村人杨孚撰的《南裔异物志》专门讲到一种“瓮人”，面体黑漆，多在大户人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瓮人”很可能是来广州贸易的商贩带来的，卖与广州的贵族大户为奴。

以上文献资料与文物遗存足以说明，秦汉时期广州已经是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贸易港了。

2

广州最早的外商记录

有外贸活动，必然有外商的参与。那么，广州到底